

明星吸毒学坏,粉丝别跟着比坏

担心明星涉毒会产生“示范”效应的心理可以理解,但相比之下,个人能否理性看待明星们的丑行,能否坚持住自己对是非的判断,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

■评论员观察

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

18日晚,北京警方证实,演员房祖名、柯震东分别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和吸食毒品被拘。据不完全统计,今年以来,已有11名演艺圈人士涉毒被抓。

娱乐明星的一举一动,可以说都是备受关注的,像涉毒被抓这样的新闻,更是容易引起轰动。在此情形之下,担心明星涉毒会产生“示范”效应的心理可以理解,但相比之下,个人能否理性看待明星们的丑行,能否坚持住自己对是非的判断,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

近期多名演艺圈人士涉毒被

抓,确实会让人产生娱乐明星成为吸毒“主力”的错觉,但事实上,吸毒人群中娱乐圈人士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。明星涉毒消息频出,更多的是源于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“光环”效应,关于他们的负面消息也更容易被媒体捕捉,为公众所关注。从现有的报道来看,是否存在涉毒违法犯罪行为,与身处哪个行业并没有本质上的因果关联,明星吸毒案件频发只是整个社会禁毒形势严峻的一个缩影。据统计,截至今年4月底,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258万人,而且低龄化趋向明显。今年6月份,济南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公安部督办毒品案件中,涉毒人员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,70余人的吸贩毒人员也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。所

以说,没有必要因为个案的出现而对娱乐行业另眼相看。

现实生活中,娱乐明星往往拥有大量的粉丝,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,确实会让人担忧。事实上,公安等相关部门依法打击明星涉毒,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清法律的界限,对于粉丝而言,则应明辨是非,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明星做了坏事,是否一定就会成为把粉丝引上邪道的“坏榜样”?关键还要看粉丝个人有无定力。粉丝对明星的欣赏,应该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光明的一面,而不要总是盯着私生活,更不能有“嗜痂”癖好、“比坏”的心理。大多数明星本来就不是作为道德楷模走上舞台的,他们也有普通人人所有的人性弱点,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败笔。其实,每个行

业都没有“完人”,教授也有学术不端的,官员也有贪污腐败的,但并不是其他人跟着“比坏”的理由。那些用“追星”来为自己违法犯罪行为辩解的人,只是在推卸责任罢了。

当然,不“放大”明星涉毒案件的社会影响,不意味着不重视案件所反映出来的严峻的禁毒形势,特别是考虑到那些欠缺分辨力的未成年人,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对于禁毒和戒毒,仅靠涉毒明星的一纸道歉远远不够,需要综合运用舆论宣传、社区戒毒、强制隔离戒毒等方式,让社会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毒品的危害。此外,还应动员全社会力量,筑起“防火墙”,不给毒品渗透以可乘之机,也把明星吸毒对粉丝的负面影响挡在外面。

■媒体视点

“热点式”募捐并非慈善常态

公开数据显示,11家公募基金在网络平台发起的针对鲁甸地震的筹款项目有近40万人参与,共筹集到了1565万元。可见,尽管中国慈善机构处于公信重塑期,但中国民间的慈善热情却并未如传说中般“烟花易冷”。在此背景下,对于公益劝募,尤须厘清权责,积极引导。

眼下,一边是少数公益组织募捐难,一边是“点对点”慈善雷厉风行。它给社会的启示也很简单:慈善组织的困局,还是“公开透明”四字。任何劝募,都不能将募捐者权益抽象化——起码要让掏钱的看到钱到哪儿去了,影响或者改变了什么。在这个资讯

发达、媒介多元的时代,劝人捐钱与个人掏钱,总该各有各的游戏规则。对于公益劝募来说,花钱比收钱更为重要,更要经得起哪怕是吹毛求疵的考量。

“一夜暴富”的捐款,奉献爱心的人们有些尴尬和纠结。而媒体越俎代庖的部分,恰恰也是公益组织亟待补上的短板。眼下,这种“热点式”慈善、“晚会式”慈善,似乎还是主流。只是,大灾大难固然需要救济,日常关爱更显慈善本色。规则上的事情,立法不能不谨慎,而公益组织的专业角色,也不能总是候场不登场。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,作者邓海建)

“重心下移”别成“责任下推”

眼下,很多地方党委政府推动工作重心下移,将工作挪到群众“家门口”。应当说,缩短服务距离本是件利民的好事,但一些部门单位布置工作后,既缺乏有力的跟踪指导服务,更缺少人、财、物等配套资源。更有甚者,将评比检查、打造亮点等任务都压给基层,今天让建个“站点”,明天叫搞个“工程”,自己却超脱为监督者、检查者。

一些工作重心流向了基层,非但没有给基层带来实惠,反而成为基层难以承受的重负。“一社区挂近60块牌子”“小社区一年要盖1000多个章”等新闻见诸媒体,折射出有些基层单位在工作作风疲于应付。

工作重心下移没问题,但必须警惕一些部门单位打着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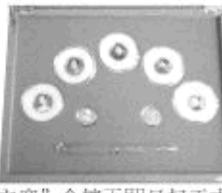
入基层的“旗号”,将服务基层、服务群众简单化、随意化,把重心下移变成责任下推。因此,工作重心下移过程中,应把群众需求作为“第一导向”,多听群众意见,多下移一些实打实的惠民举措,少移一些空对空的“形象工程”;其次,充分考虑基层实际,把握好任务与配套资源的平衡,任务下来了,相应的配套资源也得及时跟上;最后,“千斤重担还得千人挑”,基层难题不能只靠基层解决,应完善权责机制和监督机制,让各级党委政府都有压力、动力,共同发力。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,作者郭彦磊)

■本报投稿信箱:

qilupinglun@sina.com

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藏品

上海造币厂铸造发行 《毛主席金镶玉》超低价震撼发行



为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以及伟大开国领袖毛主席,上海造币厂联合铸造的“伟大领袖毛主席”金镶玉即日起正式发行!

毛泽东不同时期的经典画像为造型,既包括了庐山会议,遵义会议,天安门开国大典等历史时刻,又有新中国成立后人大会议,国庆阅兵时伟人形象!此套伟人金镶玉见证了毛主席为国操劳,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,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,收藏专家谷先生激动的说:毛主席的藏品一直是伟人藏品的领头羊,这套毛主席金镶玉还是上海造币厂特批铸造发行的,将来升值空间巨大。

发行公告:上海造币厂发行的《毛主席金镶玉》每套均有收藏证书,珠宝玉石鉴定证书以及上海造币厂发行证书!全国统一发行价6880元,特批面向社会超低价980元/套限量发行500套,(购买2套以上者赠送毛主席红笔一支)

发行地址:济南市历下区经一路30号
(济南市博物馆一楼)

发行专线:0531—88031708

全省免费送货,货到付款

《毛主席金镶玉》每套共5枚,图案是以

■公众论坛

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,北京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。几年前,他就听一位职称评委的朋友抱怨,每年临评前,总有托各种关系的客人到家里说情。(8月19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治高校职称乱象,需将利益剥离

□闫东良

当职称高低与经济利益绑定时,职称评审便成为一些人追逐利益的“角斗场”,为行贿、造假提供了温床。只有剥离附着在职称上面的利益,才能让职称还原本来的面目。

对于高校来说,重在育人。当教师们经济收入的高低,与职称和论文有关,而与教学质量关系不大时,会无奈地将主要精力放到追求论文和职称方面,大大削弱对教学上的精力投入和专业水平的提高,从而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。

要改变这样的局面,就要将附着在职称上的经济利益剥离

掉,让经济收入与教学质量“联姻”。这就意味着建立一整套不依附于职称的教师收入评定体系,对于那些受到学生欢迎、教学成绩显著的教师,不管其职称高低、年龄大小,都要让其获得与能力相称的较高收入。

不可否认的是,行政化是高校职称怪象的重要推手。“学术GDP”、职称指标等的产生,都与行政因素进入校园有因果关系。要真正实现将附着在职称上的利益剥离,还要先将高校的“去行政化”工作做好。真正做到“教育家当家”、“教授治校”时,才会让“能力”和“专业水平”成为影响高校教师待遇和地位的“关键词”。

评职称乱象生,高校教师也当自省

□张剑

必须承认,高校职称评审之所以会失去底线,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积弊重重的行政化管理状态。但是,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职称评审的乱象是管理制度上的原因,未免太过绝对。要知道,在这个小环境中,制度虽然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,但也需警醒,在它的辐射半径中,还有一大批愿意为这个制度“奔跑”的高校教师。如果没有这样的“合唱”,评审制度哪怕受到再大的压力,恐怕也不会像今天这般堪。

职称晋升带给教师最直接的好处,无非是荣誉和待遇。高校中

的一些老师将这些看得很轻,一些却把它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。这种不自然的心态,恰会反作用于教师的科研和教学中,使得自己不自觉地就成了物质和功利的“奴隶”。遥想当年的老先生们,他们嬉笑怒骂,自成一体,又何曾受制于这些功利的束缚?

所以,对于改变职称评审的尴尬现状来说,既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引领相关评选朝着合理、健康的方向上走,又没有敢于说不、勇于担当和人格独立的老师来抵制这种不合理的制度。于是,评审只能在恶性循环中遵循着逆淘汰的法则,让高校一次又一次被推至舆论的浪尖。

■一语中的

央企老总的收入应该高,但它不能高得离谱。

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,但这个差距也要符合一般企业经营管理的规律。央企薪酬制度改革,就是要让一些隐形的收入阳光化,让薪酬体系更合理。

约束公权力的法规建立了不少,但是贪污腐败依然存在,司法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。

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,法律条文完善不等于就进入了法治社会,“依法治国”涉及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,关键是要通过法律构建的制度笼子,有效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。

担任市长的副书记主持工作,经常遇到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的尴尬。

在时评作者王钟看来,“一把手”在一定时期内缺位的现象,是政治民主、官员任免遵循程序的表现,也是组织部门选任官员更加慎重的结果。不光要适应这种情况,还要制定规则,让过渡期更加平稳。

宅基地换取城市户籍,就等于要求农民交出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来换取一张纸。

在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严伟看来,宅基地是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,如果用来交换城市户籍,哪怕是“自愿、有偿”,但其实质就是用农民的私人收益换取城市户籍。特别对中小城市而言,其户籍含金量是很低的。